

1202

淮南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辑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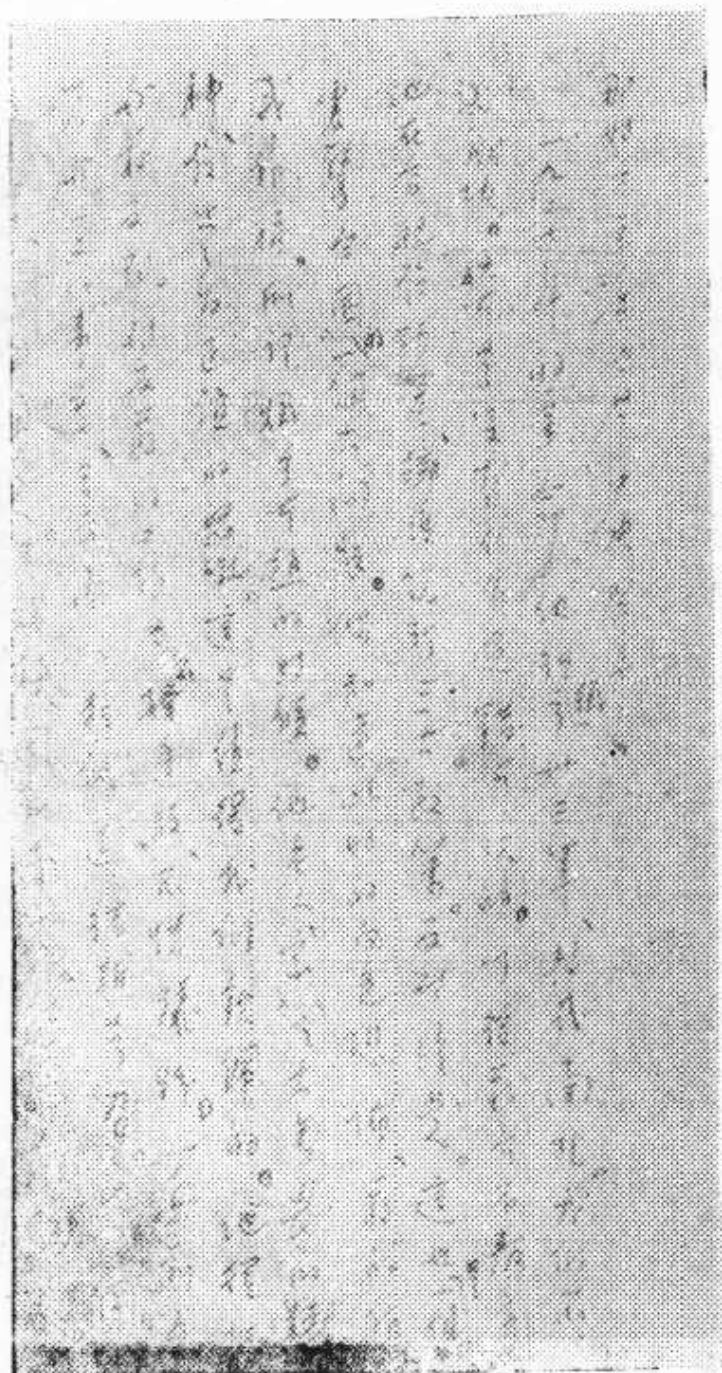


淮南文史資料选輯

第三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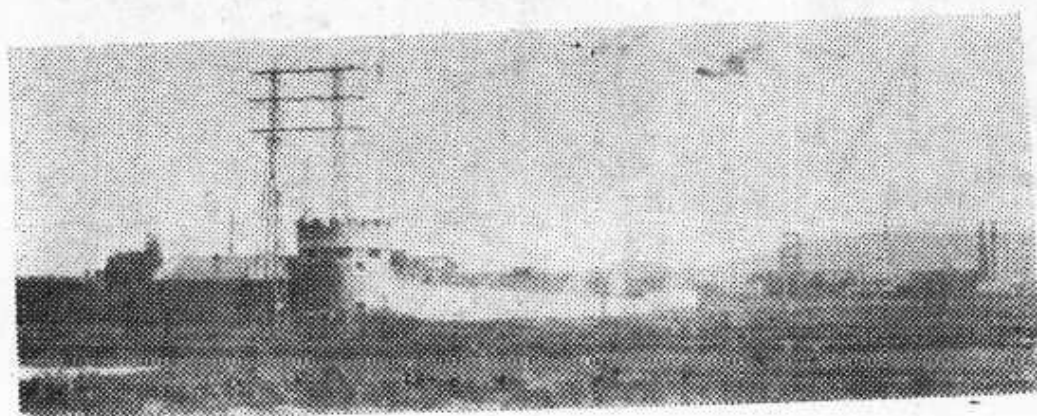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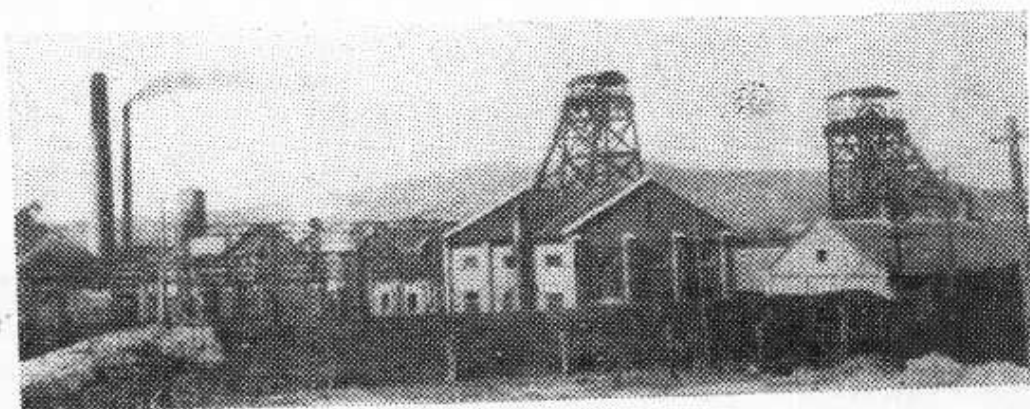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淮南市委委员会

文史資料研究委员会編



图为王坦夫致柏心慧遗书局部影印

柏心慧 供稿 吴有琦 摄影



- 上图为一九四六年的九龙岗东矿。
- 中图为一九四六年的大通矿料场。
- 下图为一九四六年的大通外景。

本栏照片均由潘企之供稿



图为一九四六年钻探八公山矿井。

潘企之 供稿

辛亥革命历史人物

缅怀先父柏烈武将军	柏心瀚 (1)
回忆父亲二、三事	柏 立 (18)
王坦夫给柏文蔚长女柏心慧的遗书	(21)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柏文蔚	朱来常 聂皖辉 (24)
柏文蔚晚年日记摘抄	王祖荃选注 (39)
柏文蔚传略(四篇)	(51)
淮上军的活动和寿县的光复	李则刚 (58)
岳相如传	岳劭之 (61)

淮南煤矿史资料

淮南矿区解放前夕纪实	潘企之 (70)
回忆淮南煤矿洗煤炼焦的发展	任廷江 (78)
日伪时期九龙岗东矿部分史料	韩允江 (91)
淮南煤矿土法炼焦的起源与发展	夏岫云 (87)
新雅读书会始末	柏方樾 (105)
解放前我做地下党工作的一些回忆	韩景顺 (96)

建国初期经济建设史料

建国初期改进磨面机器设备提高出粉率的经过	隋毓俊 (108)
我对解放初期改进碾米机械设备的一些回忆	葛开贵 (111)
回顾五十年代保证供电安全的几点做法	彭缙绅 (114)

其它史料

- 三十年代的洛河小学 宫 鹏 (117)
抗日时期的程家集 林俊杰 (123)
淮河岸畔烟花泪 吕德海 秦桂秋 马清鸣 (126)
廖运泽二斥林彪使者 (136)

文史诗词选登

- 淮南一瞬 潘效安 (138)
我要打回老家去 刘峰奇 (140)
徐昆吾遗诗一首 徐昆吾 (139)
过八公山偶成 周墨兵 (142)
六六抒怀 曹月軒 (143)
研究文史资料即兴之一(外一首) 朱霞裳 (145)
道贺 洪国宝 (144)
淮南文史资料征集参考提纲 (146)
征稿启事(封三)
补白七则 23、50、69、86、110、116、135



緬怀先父柏烈武将军

柏心瀚

先父已去世三十六年了。他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奋斗了一生。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朝腐败统治的革命活动，是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二次革命时，他是反对袁世凯的主力，为“讨袁四督”^①之一。以后他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反共政策，是国民党内反蒋的重要人物。由于他和陈独秀有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亲密关系，受其影响较大，所以始终同情中国共产党，并在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过程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47年，他在病笃期中，毅然登报辞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他一生为革命四处奔走，戎马倥偬，不问家计，清廉自守，自奉甚俭。但如亲友故旧来访，必热诚招待，有求必应，甚至倾囊相助。他禀性耿直，嫉恶如仇，从不向袁世凯、蒋介石和一般权贵们低头。他拒不接受袁世凯的重金贿赂。^②蒋介石对先父则忌恨交加，曾数次阴谋加以杀害。^③他丝毫也不因而屈从，照样反对他们。他一生的品德和操守，是值得我们子女永远铭记的。

我是他最小的儿子，我出生时他已四十九岁，因此对他的前半生，我只是得之于家人和亲友，有时也听他自己说一

些。抗日战争期间，我家避居湘西，我常随侍在侧，情况了解稍多一些。现仅就记忆所及，将印象比较深刻的事迹，加以记述，以示缅怀。

一 一生清廉自守

先父从事革命，其前半生革命工作繁忙，对于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几乎无暇过问，毕生对钱财产业视为粪土，毫不贪恋，清廉自守，安贫苦素。袁世凯以百万元贿赂，不为之所动；蒋介石亲自来访，挡架不纳④皆为例证，尚有数事记述如下：

1、先父在二次革命时，由安徽退往南京，接受江苏都督时，接管了造币厂。先父即下令封存，全部作为军用。时我家全眷均随同到宁，先父因工作繁忙，很少回家看视。家里经济拮据，一大家人开不出伙。我祖母主持家计，很为焦急。有人向他说，我父亲接管了造币厂，钱多得很。我祖母不明究竟，找我父亲来大发脾气。先父无奈，写借条借来二百元，应付家中。

2、约在1928年左右，我家搬到南京，买了祠堂巷一所房屋居住。隔壁即是国民政府财政部。后来孔祥熙托人来说，财政部要扩建，需要这块地方。并说，随便你要什么地方，盖什么样的房子，全由财政部负责。我父亲说：“既然政府需要，将这所房子奉送，我再搬到其他地方住，不劳政府费心”。当时正好先父的好友江彤侯举家北迁，把他在玄武湖的一块地皮和几间平房送给我父亲。我家即搬到玄武湖住。第二年，先父送给他五百元钱（抵作房价）。这里原来只有几间平房，家里人多，住不下，便添建了两间。此居自

称“柏园”。周围竹篱，门外有二尺多宽的小路。他在南京的几年，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及国府委员，就是在这间小木屋里度过的。

3、抗日战争时，举家迁居湘西永绥（今花垣县），随行家人、亲友、旧部，大部靠他薪金维持生计。那时，他国府委员在抗日前每月的薪金为800元，由于物价腾涨，法币贬值，生活愈来愈困难，每月到月中以后，即盼下月薪金寄来。但一寄到后，即全部分完。最初分配的方法，是按人口平均，不论家人、亲友、旧部，一视同仁，同样对待。以后，有的自谋生计，因物价腾涨，自家手中已不甚富裕，则对生活困难者仍予以补助。有时薪金未寄到，则向银行贷款。那时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只有张治中先生还念及先父曾经是他的老师，每年三节都寄点钱来。他也就靠这钱应付三大节日。记得有一次，陈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路过永绥，前来造访，看我家实在困难，后来命人送来三包平价大米。当时，我父亲认为，如果退回去，生怕陈以为嫌少，于是也就收下了（他是从来不容易接受别人馈赠的）。有一时期，他还带头和大家一起吃苞谷（玉米）饭。虽然如此，他亦从不以为苦；并且时常教育勉励我们子女：“前方战士艰苦，在后方吃点苦是应该的嘛！”

4、抗日胜利复员回南京，玄武湖的那几间房子被日本飞机炸了，没有地方住，就借住在我表哥王坦甫家中。只有我随侍在他身边。我一面在中央大学读书，一面照顾他。另有一个十九岁的小鬼，帮忙做些杂事。早晚有时搀扶他去玄武湖散散步，有时要去较远的地方，则要事先向亲友商借车子。他教育部下：“干革命不能爱钱财”，曾和老部下相

约，不为子女置产业。他死后，我们检点他的遗物，所穿衣服，多半打了补丁；其他就只有他平时写字用的几只笔，两块砚台和几锭墨而已。每当我们见到这些时，不由得潸然泪下，感到我们后辈无能，不能很好赡养侍奉，反而拖累了他一辈子，使他清贫到如此程度。一方面也为他有傲骨、不屈从、清廉自守，而为他自豪，又增加了我们对他的景仰。

二 禀性耿介一身傲骨

先父禀性耿介，嫉恶如仇，对图谋私利，危害革命，或阿谀逢迎，钻营拍马之辈，极为痛恨，甚或当面指斥，直言不讳。因此殊为某些人所不容。

1、听家人说，约在1932年左右，先父在南京到中央参加某次会议，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见他到来，立即上前招呼，并伸出手来，欲与握手。先父最不耻此二人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于是他把手一甩，昂首直入，不加理睬。弄得他俩很下不来台。

2、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制造“四·一二”事件，大搞白色恐怖。当时蒋掌握重兵，大权在握，正是盛极一时，炙手可热的时候。先父当时任三十三军军长，驻扎合肥，曾以“巧电”宣布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清党背叛革命的行为。这种不畏强暴，反对独裁，为革命伸张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在当时是令人震惊的。他的这一行动，对当时宁、汉分立的武汉政府，起到积极支持的作用。先父曾被列入武汉政府委员。

3、抗日战争时，在湘西永绥（今花垣县），曾与当地耆老合欢，即席赋七言诗一首，大骂蒋介石，诗的注释直言

“独夫民贼”。后即石印分赠与燕老人，并予散发。我曾保存一分，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落。只记得最末两句为“八公山下淮王井，风景依稀待我还”。⑤这首诗在今花垣县当地也许还能征集到。

三 不计个人得失成败，一心为革命

1、先父毕生以革命事业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成败。纵览其一生所担任的主要职务，均在革命紧要关头，为维持革命向前发展而勉力承担者。如辛亥革命，武昌刚举义旗，上海同盟会总部数次电召，他由东北回上海，和陈其美、黄克强（兴）会商决定，先父负责南京军事，黄克强负责武汉军事。但在攻下南京后，即发表通电，欢迎黄克强，黄始得到南京就任大元帅职。又于南京光复后，三军各自称雄，无人统领之际，受命为北伐军总指挥，团结各军，挥师北伐，直克徐州，清廷巢穴——北京为之震动。待南北和议，黄克强擅自撤消南京留守府，在南方革命军事失去领导的情况下，为保存一部份革命实力，在安徽极为混乱时，他就任安徽都督之职。二次革命，黄克强经不起反革命的恫吓，突然放弃讨袁军总司令的责任，由南京私自出走上海。于讨袁军事无人负责之际，先父又到南京，毅然承担了江苏省都督的职务，勉力支撑残局。以后为了保存安徽省革命力量，迎接北伐革命高潮，担任了三十三军军长。如此种种，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而承担的极为困难的工作，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先父受命于危难之际，从来不为自己个人成败得失打算。可是，为了革命的利益，虽授以要职，他亦坚决不就。如二次革命后，亡命日本时（化名朱久香），孙中山先生在东京

筹组中华革命党，要他担任中华革命党军事部长。初则他答应了，待他回到长崎寓中慎重考虑，为了协调孙（中山）黄（克强）的矛盾，避免革命阵营发生分裂，于是写信给孙中山，表示坚辞不就，并建议孙中山，军务部长职务仍由黄克强担任为宜。（于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时，黄克强赴美，军事部长由许崇智担任）至于不受袁世凯和蒋介石的收买，就更不必说了。

2、不畏英帝威胁，焚烧英商鸦片

民国元年，先父任安徽都督时，严令禁烟，通令各处，封闭烟馆，各县成立“戒烟会”，劝民戒烟。安徽戒烟在全国各省最早，而成绩又最为显著。当时有不法英商勾结安庆奸商运送大批鸦片，在安庆码头卸货，被警务人员查获。先父毅然下令，命警察厅长祁耿寰，将英商烟土全部查封。次日，英国领事向安徽省都督府提出无理抗议，同时又将英国炮舰卸去炮衣，将炮口对准南门城楼，声言二十四小时内不交出鸦片要炮轰安庆。先父毫不示弱，一面将炮兵陈列江边，与之对峙；一面不顾个人安危，亲自登上英舰与之交涉，义正词严，英人莫奈他何。恰巧这时孙中山先生从芜湖乘“江宽”号轮西上汉口，先父便乘炮艇东下迎接，把情况报告给孙中山先生后，孙先生大加赞许，极力支持。于是孙先生决定在安庆下船。登岸后，召开万人大会，先父主持大会，致词欢迎孙先生。孙先生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历数帝国主义罪恶，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当会把全部鸦片点着火，火光冲天，群众欢呼，拍手称快。一直烧到第二天清晨，大杀帝国主义威风，英人无可奈何，只得将兵舰开离。这次反帝斗争取得胜利，事后有人吟诗，把此次烧烟的义举

与林则徐相比。诗曰：“百年相望正遥遥，一炬重将毒物烧，夹岸万人齐鼓掌，笑看敌舰已惊逃。”此事当时在全国震动极大，在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四 讨袁之役

“二次革命”即讨袁之役。先父为讨袁四督之一，始终参与其事。他每谈及此，感触良深。先父对袁世凯为人反复无常和他的狼子野心，早已察觉。宋教仁在沪被刺时，先父即向中山先生申述，力主讨袁。然以黄兴对军事失去信心，主张法律解决，坐失良机。至袁氏五国大贷款成功，获得巨款，先发制人，高价收买各省高级将领，使各省反袁势力分化，军力涣散。等到中山先生决定发动正式讨袁二次革命，派黄兴到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布置各省讨袁，已为时过迟。于各省起兵后，黄忽又自南京退往上海，致各省群龙无首。此时，先父自安庆退往南京，接江苏都督职，又勉力支撑了一阵，然已无法挽回颓势，于九月中旬乘八幡丸轮东逃日本。轰轰烈烈的“二次革命”至此全部告终。

在“二次革命”期间，先父与江西李烈钧布置联合作战，随时联系，安庆、九江信使来往甚密。东渡日本后，又先后到南洋募集革命经费。因李曾在云南讲武堂担任过教习，与唐继尧有旧，与先父计议后，即赴滇策应唐继尧反袁，旋即宣布独立，护国讨袁，成立护国第一、二军，李烈钧任第二军军长。不数日，蔡锷回云南，李即将第二军交蔡，另组第三军，李为军长。出百色，逼广西，直下广东。百色一战，大破敌兵。广西陆荣廷即响应云南，宣布独立。护法一役，全国震动，动摇了袁世凯的地位，从此袁部众叛亲

离。对革命的贡献不为不大。李烈钧、方声涛与先父原拟在云南掌握一部分军事力量，以谋革命势力的发展，然唐、蔡等人均为“君宪派”，后与北洋军阀勾结成立“进步党”，掌握了西南大权，随即转向拥护段祺瑞，大失革命本意。致护法革命的成果，又为“进步党”所窃夺。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先后逃往日本。但主张不同，意见分歧。只有先父等数人追随孙中山先生，始终不渝。以后先父与黄兴等通电反对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大遭日人之忌，对发通电的几人，多方为难。而“每日新闻”、“朝日新闻”等各报冷潮热骂之文章时有登载。当时某报曾登一讽刺漫画，画上中山先生坐一轿，抬轿者为黄兴、李烈钧与先父三人。三人抬轿，倾倒不稳。意即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前途渺茫。后即有“孙黄、李、柏”之称。

李烈钧与先父在革命中相交甚厚。抗战前李住苏州，先父曾专诚往访，论及往事，相对歔歔。李去世时，先父感伤交加，亲书一联以輓。文曰：

“协和盟兄大将军灵右
叹东南二烈，讨袁四督，为中枢申威，今硕果存一，
以热泪两行，香花三献，向西方俯首，哭国土无双。

弟柏文蔚敬輓”

五 反蒋斗争

先父反对蒋介石极为坚决，一直到死，从未停止。自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先父发“巧电”，拥护孙中

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反对蒋介石“清党”，杀害共产党人，破坏国共合作，这是他正式反蒋的开始。但在这以前，先父早已不耻蒋之为人，常与人谈蒋之卑鄙阴险。1926年，在安徽组织三十三军，即是一方面为了迎接北伐革命高潮，一方面对蒋有所警惕戒备。后来我曾听先父不止一次对人说：“我早已看出蒋介石这个人靠不住，革命迟早要坏在他手里。他当北伐军总司令，我为什么愿意在他下面当三十三军军长，比他小好几倍呢？就是手里要为革命掌握一部分实力，要提防他……”

蒋介石“四·一二”叛变，先父公开通电反对。蒋之野心勃勃，阴险毒狠，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对先父和淮上健儿——三十三军，则视为眼中钉，必欲除之而后快。1928年，蒋整编三十三军为一个师，以张克瑶为师长，夺了他的兵权，给他个“北路宣慰使”的空衔。可是先父革命之心未灰，他在寿县城里又搞了个“学兵团”，委孙宜忠为团长，廖运泽为教育长，学兵团里共产党员很多，除团长、教育长是共产党员外，此外还有叶守诚、李士华等一大批党员。“学兵团”招收进步青年学生，实行军事训练，意图积蓄一部分革命力量。1930年蒋介石勒令解散“学兵团”，逮捕其中的共产党员，“学兵团”遂告瓦解。他于失意之余，无可奈何，于1930年，便到北方协助冯玉祥进行蒋、冯、阎大战，继续反对蒋介石。由于这些活动都没有得到成功，而张学良受蒋介石诱骗，带兵入关，日本人乘虚而入，造成“九·一八”事变。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而丢失东北三省。他老人家心里很难过，所以他说：“到北方本希望对国家人民有所贡献，而结果适得其反”。“九·一八”事变后，各方面

以“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相号召，先父与冯玉祥、李烈钧等联袂回到南京。虽恢复了他的国府委员，但南京政府里抗日空气稀薄，这时他势力孤单，在国民党中央的会议上说话也无用，因而他也不大去参加会议。由于心情忧郁，血压升高，常居江苏崑山和安徽枞阳两处静养。即如此，蒋还不放心，曾三次阴谋暗杀，他不得不小心防范，表面上信佛，修身养性，而内衷反蒋之意始终不减。除不时向人发泄骂蒋外，转而寄希望于共产党。以后我四哥心一参加共产党，他暗中鼓励，表面上装作不知。抗日期间，在湘西支持姐姐培师（即心锦）去延安。

1946年胜利复员，于农历六月初回到枞阳“松柏山房”故居，曾咏诗一首：

一别山房整十年，归来松柏已参天；
湖光倒影涵星斗，江水东流任变迁。
大难临头泯礼义，疮痍满目遍林泉；
何当恢复真民主，凿井耕田乐自然。

该诗的字里行间，反映了他反帝，反独裁，渴望民主的爱国思想。

先父反蒋，反独裁，从北伐开始，一直到逝世以前，是始终一贯的。有积极的行动，也有消极的不合作主义。可是他未曾搞过反蒋的组织，也没参加其他反蒋的政治团体，只是随时随地口头漫骂，有时也在诗文中表达。有人说：“他是反蒋的单干户，很不讲究策略”，这个批评是比较恰当的。

先父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兼任国民政府委员，完全是空头职称，没有任何实权，也没有具体任务，徒具虚